

城镇化为何没有推动居民消费倾向的提升？——基于半城镇化率视角的解释*

易行健 周利 张浩

摘要：在我国，目前城镇化率的提升并没有带来居民消费率的提升。本文从城镇化进程中“迁移”和“转化”的两个阶段出发，使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探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迁移”和“转化”之间的缺口——半城镇化率对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居民消费率和城镇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控制了城镇居民收入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后，半城镇化水平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也会产生负向影响；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半城镇化率提升会显著降低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同时，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城镇居民，尤其是具有城镇户籍居民的消费倾向则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此外，在低房价区域，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在高房价区域，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尤其是城镇户籍居民的消费倾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此，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快速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缩小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缺口，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关键词：半城镇化率 居民消费 户籍城镇化率 转移人口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F126.1

JEL：E21, R21

Why Does Urbanization Not Increase China's Consumption Rate?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Semi-urbanization Rate

YI Xingjian, ZHOU Li, ZHANG Hao

(School of Finance, Southern China Institute of Fortune Management Research,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the increase in the urbanization rate has not led to the increase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Driven by this observation, starting from the two stages—“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semi-urbanization rate on the resident consumption rate us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and micro data from CF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semi-urban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both the consumption rates of residents and urban residents. After controlling th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urbanization rate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the level of semi-urbanization has negative effect on the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For urban residents, after controlling the urbanization rate of the

* 易行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广州华南财富管理中心研究基地，邮政编码：510006，电子邮箱：yxjby@163.com；周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广州华南财富管理中心研究基地，邮政编码：510006，电子邮箱：zlsdtll@163.com；张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广州华南财富管理中心研究基地，邮政编码：510006，电子邮箱：haozhang@gdufs.edu.cn。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常态下建立多点支撑的消费增长格局研究”（15ZDA01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口结构变化对城镇居民住房需求的冲击：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编号 71603061）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给出宝贵的修订建议，文责自负。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opulation, the increase of the semi-urbanization rate caused by "migrant workers" coming from rural areas to cities will significantly hamper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willingness. In addition, in the regions with low housing prices, the semi-urbanization level has no obvious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tendency of urban residents. While in the regions with high housing prices, the semi-urbanization level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suppressing the consumption willingness of urban residents, especially for those with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inspire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Chinese residents, policies should be exerted to promote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ies,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urban residents with registration and reduce the level of semi-urbanization.

Keywords: Semi-Urbanizati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Urbanization Rat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itizenization of the Migrant

一、引言

消费是最终需求，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但在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过程中，消费需求的启动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过低是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2000 年以来，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基本保持稳定，但居民消费率则下降明显，由 2000 年的 46.4% 下降到 2018 年的 39.4%。在全世界最大的 12 个经济体中依然排名倒数第一，且比同时期世界平均的居民消费率低了 18.3 个百分点。为此，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更是多次召开常务会议部署推进消费扩大和升级，释放消费潜力^①。

我国作为一个处在发展和转型中的大国，城乡二元结构非常明显，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速推进城镇化可以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田雪原，2000；陈斌开等，2010；雷潇雨、龚六堂，2014）。201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明确指出，“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那么，城镇化的推进是否会带来居民消费率提升？国际经验表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消费率会呈现“先降后升并逐步趋于稳定”的轨迹特征。但我国城市化率的提高却伴随着居民消费率的下降，2000—2016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了 21.2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升 1.2 个百分点，但居民消费率却在同期下降了 7.2 个百分点。这是为何呢？陈斌开等（2010）指出大量非城镇户籍农民工的存在抑制了居民消费水平。事实上，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我国对于城镇化水平的度量一直需要关注两个指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前者为城镇人口占比，后者为非农业人口占比^②。尽管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率稳步提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 2000 年的 36.2% 增长至 2016 年的 57.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 2000 年的 24.7% 增长至 2016 年的 41.2%（见图 1）。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地拉大。早在 1990 年，两者间差距仅 5.5 个百分点，2000 年拉大到 11.5 个百分点，2010 年超过了 15 个百分点，而 2014 年差距达到了最高的 18.1 个百分点，尽管这两年差距有所下降，但 2016 年也有 16.2

^① 2018 年 9 月 20 日正式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

^② 常住人口是针对居住人口一年中居住超过 6 个月以上的区域来衡量的，分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两类；户籍人口是根据户籍登记所在地的人口类型划分的，分为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两类。

个百分点的差距^①。中国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速度远低于向城镇迁移的速度，人口城镇化缺口由此产生。对于这一现象，王春光（2006）、与文乐等（2017）称之为“半城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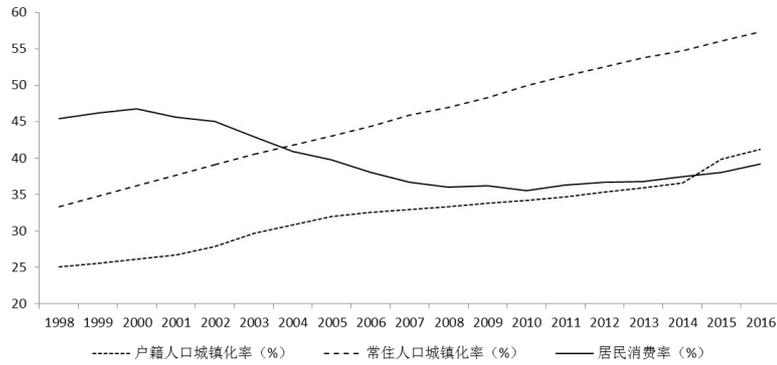


图1 我国1998-2016年城镇化水平和居民消费率

注：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

从图2来看，2010年相比2000年，我国各地区的半城镇化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上升，江西、河南等省份半城镇化水平提升了超过10个百分点；而广东、浙江、福建等省份半城镇化水平在2010年甚至超过了35%。为此，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2014—2020）》、《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和《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等多个文件，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降低人口半城镇化率，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随着“市民化”的不断推进，半城镇化现象对我国居民消费到底产生何种影响？新型城镇化战略能否有效拉动我国内需？这些都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针对人口城镇化进程中“迁移”和“转化”之间的缺口——半城镇化率对于居民消费影响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而且对于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如何，也鲜有涉及。基于此，本文将探讨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讨论农民工在“转化”过程中对于原有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从而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经验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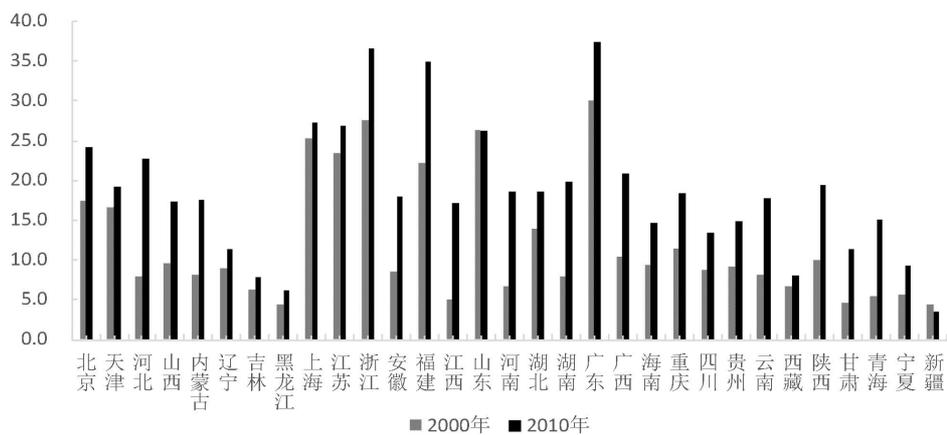


图2 2000年和2010年我国各省份半城镇化率水平 (%)

注：数据来源 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

^① 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以半城镇化为切入点，解释了为何我国城镇化率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居民消费率的提升；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系统分析了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从“迁移”和“转化”^①两个阶段探讨人口转移对于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二是在经验研究部分，不但从宏观上分析了半城镇化率对居民消费率和消费倾向的影响；而且从微观数据角度分析半城镇化率对于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特别是城镇居民中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居民的消费倾向的差异，从而丰富了相关研究文献。三是从人口的社会结构视角下为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之谜”提出一个新解释。本文的结论表明，半城镇化率的提升会显著影响我国居民的整体消费率，而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半城镇化水平的不断下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释放我国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消费潜力。

本文后续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和假设的提出，第三部分为模型的构建与计量模型设定，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稳健性检验，最后为文本的结论部分。

二、文献综述

（一）半城镇化相关文献回顾

半城镇化现象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交叉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和逾越的阶段。王春光（2006）首先提出了半城市人口的概念，主要指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心理上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到城市中，从而陷入了“非农、非城”的尴尬境地。王春光（2006）、陈丰（2007）等都将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第一阶段称为“半城市化”状态，具体表现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实现向市民“转化”的比重与向城镇“迁移”的比重之间的差额，这一缺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口城镇化的进程和质量。“半城镇化”现象引起的社会不平等对未来城市发展产生隐性压力，甚至会降低城市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性。一方面，从社会层面影响来看，处于半城镇化的农民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和住房等许多方面都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王春光（2006）从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的弱化、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以及社会认同的“内卷化”三个层面揭示我国农村人口“半城镇化”现象给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从经济层面影响来看，辜胜阻（2007）指出，中国城市的流动人口和农民工量大、质弱、价廉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工业化表现为一种低价工业化模式。潘锦云等（2014）指出，畸形发展的城镇化不仅制约了我国工业转型升级，还抑制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而且这种半城镇化率意味着大量农民工无法获得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这可能会引起更大的社会潜在矛盾（Liu et al., 2016）。从半城镇化产生的原因来看，在我国特有的二元城乡制度背景下，人口半城镇化现象的产生源于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城市倾向的公共政策、社会文化等因素（安虎森、皮亚彬，2013）。农村劳动者流动到了城镇，但却仍然保持着农民的户籍身份，这些人却没有享受到城镇的各项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使其消费受到较大抑制（蔡昉，2010）。半城镇化不仅标志了城镇化进程的不完全，还意味着2亿多农民工在社会认同、经济行为和心理上与城市户籍居民有巨大的差异。

^① “迁移”是指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空间上向城镇的转移和集聚；而“转化”则具有更高的层次和内涵，表现为在城市生活的农村户籍居民在身份、工作环境、生活习惯、社会认同等方面融入城镇的“市民化”过程，由农民向城镇户籍居民转变。

（二）城镇化与居民消费相关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城镇化与消费的研究大多强调城镇化进程可以通过提升居民收入而促进消费（田雪原，2000；李通屏、成金华，2005；周建、杨秀祯，2009；辜胜阻等，2009；邹红、喻开志，2011），特别是强调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Brauw & Giles，2018；易行健等，2012；姚星等，2017）；或强调城镇化通过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来扩大消费需求（Fujita, et. al, 1999；Henderson & Wang，2005）。然而，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后如果不能获得城镇户籍，难以享受与城镇户籍居民同样的社保、医疗以及教育等各种公共服务，因此在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其消费意愿必然不足。蔡昉（2010）采用 2008 年我国农村居民就业及消费数据发现，农民工获得的收入偏低和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的不健全抑制了其消费能力。陈斌开等（2010）采用 2002 年 22 个省的城镇居民和城镇移民家庭及个人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 14.6 个百分点，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有效提升居民总体消费水平。陈忠斌、蔡东汉（2011）利用 1991-2009 年中国 31 个省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口消费支出和收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居民总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而且趋于上升；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对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位居第二但趋于下降；农村向城镇人口迁移引起的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三。Chen et al.（2015）指出，由于农村到城市（包括城市间）的移民数量不断增长，同时，受制于户籍身份，外来移民预期未来回乡后收入将下降，从而在当前更多将收入进行储蓄以平滑消费。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险覆盖率相对较低，从而有更多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张勋等（2014）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探讨中国农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结果发现，农民工的边际储蓄倾向比农民和城镇居民高，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持续转移的进程中，农民工群体的高储蓄行为也推动了农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上升和消费率的下降。由此可见，由于城镇化的不彻底所引起的缺口严重影响了我国居民整体消费潜力的发挥。

综上所述，已有相关研究更多关注常住人口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当然也有部分研究关注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消费的行为（蔡昉等，2001；陶然、徐志刚，2005；陈斌开等，2010；张勋等，2014），或对农民工市民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蔡昉，201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胡秋阳，2012）。这些研究重点在于讨论农民工群体消费行为的变化，但针对人口城镇化进程中“迁移”和“转化”之间的缺口——半城镇化率对于消费影响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也鲜有文献涉及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基于此，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探讨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重点讨论农民工在“转化”过程中对于原有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三、模型的构建与计量模型设定

（一）模型的构建与假设的提出

借鉴余华义（2015）以及 Jetter & Parmeter (2013)等文献，假设一个地区的居民可分为三类：城市居住的城市户籍居民 u 、农村居住的农村户籍居民 r 以及在城市里面居住的农村户籍居民 ur 。地区的人口总数为 N ，三类居民的数量分别为 N_u 、 N_r 和 N_{ur} 。则该地区人

口总数可以表示为 $N = N_u + N_r + N_{ur}$ 。假设居民的收入分配在两类商品上： C 为居民所购买的用于一般消费品的消费品； G 为所购买的保障，可理解为储蓄（理财产品）、社会保险等等。 M 表示消费者所在区域（农村或者城市）保障品市场的活跃度，那么对于每个居民而言，假设其效用函数满足 CES 效用函数形式，即： $U = [G^\alpha M + C^\alpha]^\frac{1}{\alpha}$ 。假设其收入 y 是外生的，并且收入全部用于购买两种商品，即： $y = p_G G + p_C C$ 。那么对于城市户籍居民而言，在收入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转化为：

$$\max U_u = [G_u^\alpha M_u + C_u^\alpha]^\frac{1}{\alpha} \quad (1)$$

$$s.t. y_u = p_{G_u} G_u + p_C C_u \quad (2)$$

进一步，假设整个城镇化进程分为两步：一是人口城镇化，即人口是由农村户籍人口转移为城市居住的农村户籍人口；二是户籍城镇化，即城市居住的农村户籍人口再转变为城市居住的城市户籍人口，当然，这个过程并不绝对是单向的，在某些特殊时间、特定的区域时可能存在逆城镇化的过程，但并不影响我们分析的主要结论。模型的分析结论^①表明那么当人口由农村户籍人口转移为城市居住的农村户籍人口时（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半城镇化率升高），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减小。因此，没有户籍转变、只考虑人口转移的城镇化进程会降低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而当城市居住的农村户籍人口不断向城市户籍人口转变并实现市民化时，这意味着半城镇化水平在下降。户籍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的影响可以体现在随着人口结构变动，消费倾向的相对变动。这意味着当城市人口由非城镇户籍向城镇户籍转移时，模型分析结论表明城镇居民的整体消费倾向会得到提升。即户籍城镇化能够有效推动城市居民的整体消费能力。基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的假设^②：半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会降低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半城镇化水平的下降会提升城镇居民消费倾向。

（二）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所关注的是半城市化率水平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利用 2000-2014 年 31 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的宏观面板数据，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C_{it} = \alpha_0 + \alpha_1 P U_{it} + \beta' X_{it} + 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 C_{it} 表示居民消费， $P U_{it}$ 表示人口半城镇化率。 X_{it} 则表示各省份的产业结构、政府行为、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一系列控制变量。

（三）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① 更为具体的模型构建过程以及变量的定义详见文后附录或向作者索取。

^② 半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其实是常住人口增加引起了，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引起了半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半城镇化水平的下降，则是由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引起的。

本文设定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消费率 (*res*) 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 (*cr*), 且进一步探讨了城镇居民消费率 (*ures*) 和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 (*ucr*) 的影响。其中居民消费率为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关注解释变量为人口半城镇化率 (*PU*), 衡量标准则参考李爱民 (2013) 与文乐等 (2017) 的方法, 表示为 (城镇常住人口-城镇户籍人口)/城乡常住人口。控制变量主要分为如下几类: (1) 第二产业占比 (*second*) 和第三产业占比 (*third*), 体现各省的产业结构的差别, 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来分别表示; (2) 政府消费率 (*gov*), 体现各地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 用各地区政府消费率来表示; (3) 老年抚养比 (*old*), 体现各地区人口结构的影响, 用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中老年部分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来表示; (4) 人均 GDP 增长率 (*rgdp*) 和城乡居民消费比 (*cratio*), 反映各省的经济发展情况和消费差异, *rgdp* 用各省实际人均 GDP 的增长速度来表示, *cratio* 用各省城乡居民平均消费之比来表示。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本文选取的是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2000-2014 年的数据, 对人均 GDP、收入和消费等都以 2000 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①。相关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i>PU</i>	半城镇化率	0.138	0.080	0.004	0.362	465
<i>UR</i>	城镇化率	0.474	0.152	0.222	0.893	465
<i>res</i>	居民消费率	0.367	0.068	0.217	0.621	465
<i>ures</i>	城镇居民消费率	0.245	0.052	0.122	0.417	465
<i>cres</i>	农村居民消费率	0.121	0.065	0.018	0.367	465
<i>second</i>	第二产业占比	0.456	0.083	0.197	0.591	465
<i>third</i>	第三产业占比	0.415	0.079	0.283	0.779	465
<i>gov</i>	政府消费率	0.155	0.057	0.085	0.498	465
<i>old</i>	老年抚养比	11.843	2.528	6.100	21.880	465
<i>rgdp</i>	人均实际 GDP 增速	0.107	0.027	0.037	0.236	465
<i>uy</i>	城镇居民平均收入 (元)	14590.6	7939.5	4724.1	48841.4	465
<i>uc</i>	城镇居民平均消费 (元)	10487.9	5243.4	3623.6	35182.4	465
<i>cy</i>	农村居民平均收入 (元)	5269.4	3526.1	1330.8	21191.6	465
<i>cc</i>	农村居民平均消费 (元)	4377.8	7368.5	1000.3	125121	465
<i>cratio</i>	城乡居民消费比	3.102	0.790	1.600	8.900	465

四、实证分析

(一) 基本实证结果

1. 半城镇化率影响居民消费实证检验的基准回归

表 2 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2) 和 (4) 列的结果分别体现了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居民消费率和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 半城镇化率的提升会显著降低我

^① 对于消费和收入采用以 2000 年的 CPI 为定基 (100), 后续年份按照定基比的 CPI 指数进行平减; 人均 GDP 则采用 GDP 平减指数以 2000 年为基期 (100), 按照定基比的 GDP 平减指数进行平减。从而得到以 2000 年为基期的实际 GDP、实际消费和实际收入。

国居民总体的消费率水平。半城镇化率的提高意味着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与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之间缺口的加大，但由于“迁徙”的农村居民并未真正“转化”为市民，在这一过程中“非农、非城”的境地使得农民工尽管收入有所增加，但消费意愿较低，所以居民消费率下降。对于城镇居民而言，（3）和（4）列的结果和我们的预期并不相符合。但考虑到半城镇化是城镇化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我们猜测这可能是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为此，我们在（5）列中引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UR。结果表明，当控制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后，半城镇化率的降低（即意味着户籍城镇化率向人口城镇化率靠拢）会显著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率水平。表 2 的实证结果一方面体现了近年来我国半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降低的典型事实，同时也印证中央政府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市民化进程、降低半城镇化水平能有效提升我国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

表 2 半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

	(1) <i>res</i>	(2) <i>res</i>	(3) <i>ures</i>	(4) <i>ures</i>	(5) <i>ures</i>
<i>PU</i>	-0.236** (0.101)	-0.0430** (0.0209)	0.173*** (0.0293)	0.0970*** (0.0268)	-0.182*** (0.0524)
<i>second</i>		-0.925*** (0.0682)		0.307*** (0.0785)	0.0690 (0.0824)
<i>third</i>		-0.468*** (0.0788)		0.748*** (0.0774)	0.509*** (0.0955)
<i>gov</i>		0.0769 (0.0618)		-0.135 (0.116)	-0.0992 (0.103)
<i>old</i>		-0.00464*** (0.00107)		-0.00105 (0.000812)	-0.00351*** (0.00120)
<i>rgdp</i>		-0.0507 (0.0373)		0.0367 (0.0649)	0.0569 (0.0558)
<i>cratio</i>		0.0131*** (0.00418)		0.0210*** (0.00712)	0.0222*** (0.00679)
<i>UR</i>					0.331*** (0.0303)
常数	0.400*** (0.0201)	0.993*** (0.0746)	0.221*** (0.00711)	-0.251*** (0.0743)	-0.142* (0.0756)
观测值	465	465	465	465	465
组间R ²	0.0592	0.6856	0.0501	0.2448	0.3312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系数下的括号中为稳健标准差。

2. 半城镇化率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表3中，我们研究了半城镇化率对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从（1）-（4）来看，半城镇化率对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收入也受到半城镇化率的影响，因此我们进一步来分析收入的中介作用。（5）式结果表明，回归中控制了居民收入后，半城镇化率对于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再显著，这表明收入的中介作用明显。那么半城镇化率对于城镇居民消费是否真的没有影响呢？我们进一步在方程中控制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结果（6）表明，半城镇化率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这表明，一旦控制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半城镇化率的变动则源于户籍城镇化水平，若市民化速度加快，户籍城镇化率提升，引起半城镇化率的下降，进而提升城镇居民消费水平^①。

^① 由于表 3 第（6）的结果中，PU 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 PU 减小会显著提升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因为回归中控制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那么 PU 的变动负向同步于户籍城镇化率，即当控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时，户籍城镇化率的提升会降低半城镇化率，进而引起消费的提升。

表3 半城镇化率与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

	(1) <i>lnuy</i>	(2) <i>lnuy</i>	(3) <i>lnuc</i>	(4) <i>lnuc</i>	(5) <i>lnuc</i>	(6) <i>Lnuc</i>
<i>PU</i>	5.351*** (1.292)	2.632*** (0.397)	4.836*** (1.137)	2.409*** (0.348)	-0.001 (0.334)	-0.077** (0.031)
<i>second</i>		10.42*** (0.802)		9.273*** (0.713)	-0.2669*** (0.057)	-0.264*** (0.061)
<i>third</i>		12.35*** (0.634)		11.01*** (0.641)	-0.296** (0.125)	0.278** (0.127)
<i>gov</i>		-1.301** (0.529)		-1.071** (0.521)	0.119 (0.129)	0.122 (0.115)
<i>old</i>		0.0280* (0.0146)		0.0277** (0.0126)	0.002 (0.0013)	0.0014 (0.0013)
<i>rgdp</i>		-0.676 (0.558)		-0.815 (0.531)	-0.196*** (0.0565)	-0.194*** (0.055)
<i>cratio</i>		-0.178*** (0.0463)		-0.131*** (0.0451)	0.0322*** (0.005)	0.0312*** (0.0047)
<i>lnuy</i>					0.915*** (0.006)	0.908*** (0.0083)
<i>UR</i>						0.116* (0.0621)
常数	8.708*** (0.162)	-0.344 (0.555)	8.473*** (0.141)	0.281 (0.527)	0.596*** (0.678)	0.631*** (0.622)
观测值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组间R ²	0.2607	0.7819	0.2643	0.7656	0.9927	0.9928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系数下的括号中为稳健标准差。

3. 半城镇化率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分析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半城镇化水平显著影响城镇居民消费，那么对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影响如何呢？我们进一步在表4中展开分析。表4中（1）、（2）的结果表明，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半城镇化率对于其消费倾向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的，考虑到表4中（1）与（3）、（2）与（4）的结果，在不考虑城镇化水平时，半城镇化率的提高引起收入的增加要比消费高，进而降低其消费倾向。而（3）的结果则表明，当控制了户籍城镇化率（HUR）后，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即半城镇化水平增加）将对城镇居民消费带来负向冲击。这意味着，如果不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难以促进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提升。

表4 半城镇化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

	(1) uc/uy	(2) uc/uy	(3) uc/uy
<i>PU</i>	-0.368*** (0.119)	-0.155*** (0.0418)	-0.203*** (0.0600)
<i>second</i>		-0.836*** (0.0757)	-0.670*** (0.0864)
<i>third</i>		-0.955*** (0.109)	-0.783*** (0.123)
<i>gov</i>		0.184* (0.102)	0.142 (0.119)
<i>old</i>		-0.000566 (0.00174)	0.000945 (0.00174)
<i>rgdp</i>		-0.120** (0.0467)	-0.128*** (0.0466)
<i>cratio</i>		0.0362*** (0.00327)	0.0347*** (0.00314)
<i>HUR</i>			-0.215*** (0.0490)

常数	0.789*** (0.0162)	1.405*** (0.0556)	1.331*** (0.0584)
观测值	465	465	465
组间R2	0.1256	0.5991	0.6164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系数下的括号中为稳健标准差。

（二）进一步分析：基于微观视角

1.半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户籍差异影响分析

前文的分析中，我们使用宏观数据从居民消费率和居民消费倾向两个方面研究了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具有显著负向作用。根据现行统计制度，城镇居民中包含了具有城镇户籍的市民以及没有城市户籍而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半市民”。为了进一步分析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城镇居民中是否具有城市户籍人口的影响差异，本文采用微观数据展开进一步的分析。与前文分析不同的是，微观数据样本可以使我们能够区分城镇居民中，城市户籍的居民和农村户籍的居民之间的差别。本部分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数据组成面板数据，并且参照已有相关研究，我们的分析对象为消费倾向在0和1之间的城镇家庭样本。本文所关注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消费倾向(*res*)，解释变量人口半城镇化率(*PU*)定义同前文一致。考虑了家庭收入水平、家庭规模、家庭净资产、家庭中老年人和儿童的数量占比等家庭控制变量，以及其他诸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状况、健康状况、医疗保险等户主特征控制变量^①。

表5结果表明，半城镇化水平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意味着，在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半城镇化率的降低（由于控制了常住人口城镇化比率，半城镇化率的降低即意味着户籍城镇化率提升并向人口城镇化率靠拢）会显著促进城镇户籍居民消费倾向。而对于农村户籍居民，即便控制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半城镇化水平的变动依然不会影响到其消费倾向。对此，我们解释是，半城镇化率的降低，意味着更多的原农村户籍的城镇居民成为了具有城镇户籍的“新市民”，他们开始可以享受子女上学、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降低，因此消费意愿增强，从而提升城镇籍居民的消费倾向。事实上，根据陈斌开等（2010）、张勋等（2014）以及雷潇雨、龚六堂（2014）的研究结论，城镇居住的农村户籍居民消费意愿最小，具有强烈的储蓄动机，而推动户籍城镇化，使这部分群体实现户籍转化可以有效地促进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提升。而农村户籍居民尽管居住在城镇，但依然属于农村户籍，这部分群体在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之前，大多保持原来的生活习惯，因此受到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5 基于微观数据的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

	(1) <i>res</i>	(2) <i>res</i>	(3) <i>res</i>	(4) <i>res</i>	(5) <i>res</i>
	全样本	城镇户籍		农村户籍	
<i>PU</i>	-0.099** (0.042)	-0.432* (0.251)	-0.408** (0.206)	0.327 (0.285)	0.267 (0.278)

^①我们的宏微观模型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所关注的被解释变量以及解释变量在基本定义上是相同，相对而言还是可以反映出来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实现研究目的。具体微观数据的基本定义和统计性描述参见文后附表。半城镇化率 *PU* 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UR* 的定义同前。

<i>UR</i>	0.552** (0.233)	1.298*** (0.298)	1.275*** (0.234)	-0.016 (0.308)	0.145 (0.275)
是否控制其他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是否控制地区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7360	4707	4707	2653	2653
R ²	0.112	0.130	0.189	0.117	0.185

注：1.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系数下的括号中为稳健标准差；2. 本表控制变量同表4，由于篇幅限制没有全部列出来。

2. 区域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注意到，从长期来看，半城镇化水平的上升最终会引起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这在整体上便体现在城镇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对于城镇居民而言，消费倾向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于未来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储蓄的增加。而这其中，受到城镇化影响较大的便是住房问题。为此，我们根据样本城市房价水平的高低将样本分为高房价区域和低房价区域，分析在不同区域半城镇化水平对于消费倾向的影响。在高房价区域，随着外来人口数量的增加，住房的需求会进一步扩大，城镇户籍居民为了购买住房不得不储蓄或偿还住房抵押贷款，因此可能会压缩家庭消费降低消费倾向；农村户籍居民由于购房意愿并不强烈因此受到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而在低房价区域，无论城镇户籍居民还是农村户籍居民受到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在低房价区域，半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于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居民的消费倾向都没有影响。而在高房价区域，相对于农村户籍居民，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存在明显的负向效应。结合PU系数的回归结果，可以认为，在高房价区域，半城镇化水平显著抑制了城镇户籍居民的消费倾向。

表6 半城镇化水平在不同房价区域对于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

	(1)	(2)	(3)	(4)
	<i>res</i>	<i>res</i>	<i>res</i>	<i>res</i>
	高房价区域		低房价区域	
PU	-0.422 (0.678)	-0.282 (0.663)	0.182 (0.364)	0.364 (0.341)
<i>UR</i>	0.991* (0.519)	1.023** (0.512)	0.423 (0.448)	0.241 (0.416)
<i>hukou*PU</i>	-0.561** (0.242)	-0.597*** (0.226)	-0.067 (0.067)	-0.086 (0.074)
是否控制其他变量	Yes	Yes	Yes	Yes
是否控制地区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3538	3538	3822	3822
R ²	0.150	0.209	0.112	0.168

注：1. 房价均值的划分，我们依据样本家庭所在地区的房价水平进行排序，前50%的为高房价区域，后50%的为低房价区域。2.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系数下的括号中为稳健标准差；3. 本表控制变量同表4，由于篇幅限制没有全部列出来。

(三) 稳健性检验

在前文的宏观分析中，由于半城镇化计算中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我们只能使用省级层面的半城镇化率指标。由于市一级的指标只有在人口普查年份才能取得，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则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各地市半城镇化率指标。我们将其与2011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数据进行匹配。之所以采用CHFS2011的数据是因为：一是CHFS2011里面涉及到的家庭数据大多为家庭2010年的实际发生额，这与2010年的半城镇化率具有更好的匹配

性；二是因为微观数据中CHFS数据可以实现地市级别的识别，从而实现与城市层面的半城镇化率进行匹配；三是通过使用不同于CFPS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以进一步体现前文结果的稳健性。参照已有相关研究，我们的分析对象为消费倾向在0和1之间的城镇家庭样本。表7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城镇化水平的前提下，半城镇化率较高地区的居民消费倾向整体偏低，这与前文的分析相一致。而进一步比较城镇户籍居民和农村户籍居民家庭的消费倾向，通过引入 $hukou*Pu$ 可以发现，相对于非城镇户籍家庭，城镇户籍家庭消费倾向受到半城镇化水平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为了进一步寻找原因，我们分别对两个子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当控制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后，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城镇户籍居民的消费倾向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半城镇化率越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越低）的地区，城镇户口居民的消费倾向越低。这也从微观层面印证了表5中的部分结论，即只有户籍城镇化才是真正的新型城镇化。通过提升户籍城镇化水平，才能有效提升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

表7 半城镇化率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

	城镇居民消费倾向	城镇居民消费倾向	城镇居民消费倾向	城镇居民消费倾向 (城市户籍)	城镇居民消费倾向 (农村户籍)
PU	-0.223*** (0.0566)	-0.239*** (0.0624)	-0.111 (0.0942)	-0.295*** (0.0685)	0.0130 (0.155)
UR	0.0550 (0.0501)	0.0827 (0.0556)	0.0864 (0.0556)	0.105* (0.0603)	-0.0305 (0.144)
$hukou$			0.0501* (0.0287)		
$hukou*PU$			-0.162* (0.0867)		
是否控制其他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N	2614	2226	2226	1668	558
R^2	0.012	0.031	0.032	0.043	0.020

注：1.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系数下的括号中为稳健标准差；2. 本表还控制家庭人口统计学特征和户主特征等相关变量，由于篇幅限制没有全部列出来。

五、 结论与启示

城镇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更是农村人口在劳动与消费、生活习惯、社会行为和心里准备等各个方面全面融入城市的过程。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既没有完全脱离农村，同时也没有完全融入城市，成为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半城镇人口”。本文采用省级宏观数据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等微观数据，从我国特有的半城镇化角度回答了为何我国城镇化率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居民消费率的提升这一问题，并分析了半城镇化对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首先，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居民消费率和城镇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控制了城镇居民收入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后，半城镇化水平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也会产生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加快“农民工”向城镇户籍人口转变，降低半城镇化水平可以有效提升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其次，对于城镇居民而言，控制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所引起的半城镇化率提升会显著降低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再次，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城镇居民，尤其是具有城镇户籍居民的消费倾向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最后，本文还发现，在低房价区域，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在高房价区域，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城镇居民

消费倾向，尤其是城镇户籍居民的消费倾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城镇化进程有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消费习惯改变和消费水平的提升，然而我国的城镇化进程长期来无法有效拉动消费。本文的结论则为这一谜题提供了一个解释，即我国的城镇化尚以“迁移”过程为主，人口城镇化进程远远落后于户籍城镇化进程，市民化进程的滞后加剧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储蓄动机，进而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增长。为此，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市民化进程，缩小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缺口，降低长期以来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福利和身份歧视，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居民的权利平等和社会融合，降低农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一方面，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加大力度推进 300 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进一步放松 300 万—500 万的大城市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超大特大城市要进一步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增加落户规模。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服务力度，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减少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的限制和障碍、增加对农业转移人口在住房、基本医疗、教育、职业培训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支出。

参考文献：

- 安虎森 皮亚彬，2013：《半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研究》，《经济与管理评论》第 3 期。
- 蔡昉 都阳 王美艳，2001：《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经济研究》第 12 期。
- 蔡昉，2010：《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中国人口科学》第 1 期。
- 蔡昉，2010：《户籍制度改革与城乡社会福利制度统筹》，《经济学动态》第 12 期。
- 陈斌开 陆铭 钟宁桦，2010：《户籍制约下的居民消费》，《经济研究》第 S1 期。
- 陈丰，2007：《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社会科学》第 2 期。
- 陈忠斌 蔡东汉，2011：《居民消费增长的路径选择——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 6 期。
- 辜胜阻 易善策 李华，2009：《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 1 期。
- 辜胜阻，2007：《统筹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改进低价工业化和半城镇化模式》，《中国人口科学》第 5 期。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第 6 期。
- 胡秋阳，2012：《农民工市民化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基于浙江 CGE 模型的模拟分析》，《管理世界》第 3 期。
- 雷潇雨 龚六堂，2014：《城镇化对于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 6 期。
- 李爱民，2013：《中国半城镇化研究》，《人口研究》第 4 期。
- 李通屏 成金华，2005：《城市化驱动投资与消费效应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 5 期。
- 潘锦云 姜凌 丁羊林，2014：《城镇化制约了工业化升级发展吗——基于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的视角》，《经济学家》第 9 期。
- 陶然 徐志刚，2005：《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一个转轨中发展的大国视角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第 12 期。
- 田雪原，2000：《人口城市化驱动消费需求效应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 2 期。
- 王春光，2009：《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实证分析》，《学习与探索》第 5 期。
- 王春光，2006：《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 文乐 彭代彦 覃一冬，2017：《土地供给、房价与中国人口半城镇化》，《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 4 期。
- 姚星 杜艳 周茂，2017：《中国城镇化、配套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拉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 4 期。
- 易行健 吴庆源 杨碧云，2012：《收入差距与消费行为的城乡示范效应——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 3 期。
- 余华义，2015：《城市化、大城市化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变动》，《经济研究》第 10 期。

- 张勋 刘晓 樊纲, 2014: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户储蓄率上升》, 《经济研究》第 4 期。
- 周建 杨秀祯, 2009: 《我国农村消费行为变迁及城乡联动机制研究》, 《经济研究》第 1 期。
- 邹红 喻开志, 2011: 《劳动收入份额、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居民消费》,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 3 期。
- Chen, B., M. Lu, & N. Zhong (2015), "How urban segregation distorts Chinese migrants' consumption?", *World Development* 70: 133-146.
- Brauw, A. & Giles, J. (2018), Migrant labor markets and the welfare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Evidence from chin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32(1), pages 1-18.
- Fujita, M., P. Krugman, & T. Mori (1999), "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2): 209-251.
- Henderson, J. V., & H. G. Wang (2005), "Aspects of the rural-urban transformation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5(5): 23-42.
- Jetter, M. & C. F. Parmeter (2013), "Does urbanization mean bigger governments?",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4): 1202-1228.
- Liu, X., G. Cao & T. Liu (2016), "Semi-urbanization and evolving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sights from the 2000 to 2010 national censuses",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6(11): 1626-1642.

附录：模型的建立与推导具体过程

(一) 模型假设

1、市场的基本假设。

借鉴余华义（2015）以及 Jetter & Parmeter (2013)等文献，假设一个地区的居民可分为三类：城市居住的城市户籍居民 u ，农村居住的农村户籍居民 r 以及在城市里面居住的农村户籍居民 ur 。地区的人口总数为 N ，三类居民的数量分别为 N_u 、 N_r 和 N_{ur} 。则该地区人口

总数可以表示为 $N = N_u + N_r + N_{ur}$ 。

假设居民的收入分配在两类商品上， C 为居民所购买的用于一般消费品的消费品， G 为所购买的保障，可以理解为储蓄（理财产品）、社会保险等等； M 表示消费者所在区域（农村或者城市）保障品市场的活跃度。保障品在城市和农村分别由不同的市场分别提供，假设农村地区的平均市场交易量为 m_r ，那么农村地区的交易总量为 $M_r = m_r N_r$ ；城市地区的平均市场交易量为 m_u ，那么城市地区的交易总量为 $M_u = m_u (N_u + N_{ur})$ 。而对于城市里面居住的农村户籍居民而言，由于其没有城市户籍，因此对于保障会具有相对更大的偏好，从而假设 $M_{ur} = \varphi M_u$ ($1 < \varphi$)。假设一般消费品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是全流通的，因此其具有统一的价格 p_c 。而保障品的价格因为具有城乡差异，因此在城市和农村两个市场具有不同的价格。假设当人口数量更大时对于保障品的需求会更大从而推升价格。为不失一般性，假设 $p_{Gr} = f(N_r)$ ，且 $f'(N_r) > 0$ ， $f''(N_r) < 0$ ； $p_{Gu} = f(N_u)$ ，且 $f'(N_u) > 0$ ， $f''(N_u) < 0$ 。而对于城市里面居住的农村户籍居民而言，其所购买的保障品依靠城市供给，且由于其具有更大的偏好，从而也会面临更高的价格，因此假设 $p_{Gur} = \theta p_{Gu}$ ，且 $\theta > 1$ 。同时，我们假设 $\theta \leq \varphi$ ，这保证了城市里面居住的农村户籍居民的个人偏好不会因为定价过高而无法实现。

2、居民行为假设。

对于每个居民假设其效用函数满足 CES 效用函数形式，即： $U = [G^\alpha M + C^\alpha]^{\frac{1}{\alpha}}$ 。假设其收入 y 是外生的，并且收入全部用于购买两种商品，即： $y = p_G G + p_C C$ 。

那么对于城市户籍居民而言，在收入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转化为：

$$\max U_u = [G_u^\alpha M_u + C_u^\alpha]^{\frac{1}{\alpha}} \quad (A1)$$

$$s \ t \ y_u = p_{Gu} G_u + p_C C_u \quad (A2)$$

由一阶条件可以得到：

$$C_u^* = y_u \left[p_C + (p_{Gu})^{\frac{\alpha}{\alpha-1}} \cdot (M_u)^{\frac{1}{1-\alpha}} (p_C)^{\frac{1}{1-\alpha}} \right]^{-1} \quad (A3)$$

在城市居住的城市户籍居民的消费倾向（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可以表示为：

$$\frac{p_C C_u^*}{y_u} = \frac{1}{1 + (p_{Gu})^{\frac{\alpha}{\alpha-1}} \cdot (M_u)^{\frac{1}{1-\alpha}} (p_C)^{\frac{1}{1-\alpha}}} \quad (A4)$$

同理可以得到在城市里面居住的农村户籍居民的最优消费量和消费倾向分别为：

$$C_{ur}^* = y_{ur} \left[p_C + (p_{Gur})^{\frac{\alpha}{\alpha-1}} \cdot (M_{ur})^{\frac{1}{1-\alpha}} (p_C)^{\frac{1}{1-\alpha}} \right]^{-1} \quad (A5)$$

$$\frac{p_C C_{ur}^*}{y_{ur}} = \frac{1}{1 + (p_{Gur})^{\frac{\alpha}{\alpha-1}} \cdot (M_{ur})^{\frac{1}{1-\alpha}} (p_C)^{\frac{1}{1-\alpha}}} \quad (A6)$$

分别用 n_r 、 n_u 和 n_{ur} 表示 N_r 、 N_u 和 N_{ur} 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那么：

$$n_r = \frac{N_r}{N_u + N_r + N_{ur}}, \quad n_u = \frac{N_u}{N_u + N_r + N_{ur}}, \quad n_{ur} = \frac{N_{ur}}{N_u + N_r + N_{ur}}。 \text{从而根据城镇化的概念}$$

可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水平可以表示为 $n_u + n_{ur}$ ，而半城镇化率则可以通过 n_{ur} 来表示。

整个城镇化进程分为两步：一是人口城镇化，即人口是由农村户籍人口转移为城市居住的农村户籍人口；二是户籍城镇化，即城市居住的农村户籍人口再转移为城市居住的城市户籍人口。那么在总人口 N 相对固定的前提下， n_{ur} 的提升意味着农村户籍人口向城市居住的农村户籍人口转移，这意味着农村户籍人口的减少；而 n_{ur} 的下降则意味着城市居住的农村户籍人口向城市户籍人口转移，这意味着城市户籍人口的增加。

（二）人口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

当人口由农村户籍人口转移为城市居住的农村户籍人口时（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

半城镇化率升高), 城市居民消费倾向 $\left(\frac{p_c(N_u C_u^* + N_{ur} C_{ur}^*)}{N_u + N_{ur}} \right)$ 的变动情况为:

$$\frac{\partial \left(\frac{p_c(N_u C_u^* + N_{ur} C_{ur}^*)}{N_u + N_{ur}} \right)}{\partial N_{ur}} = \frac{p_c}{(N_u y_u + N_{ur} y_{ur})^2} \left[(N_u y_u + N_{ur} y_{ur}) \left(N_u \cdot \frac{\partial C_u}{\partial N_{ur}} + N_{ur} \cdot \frac{\partial C_{ur}}{\partial N_{ur}} \right) + N_u y_{ur} y_u \left(\frac{C_{ur}}{y_{ur}} - \frac{C_u}{y_u} \right) \right] \quad (A7)$$

$$\text{其中, } \frac{\partial C_u}{\partial N_{ur}} = \frac{-y_u p_c \left[\frac{1}{1-\alpha} (p_{Gu})^{\frac{\alpha}{\alpha-1}} \cdot (M_u)^{\frac{\alpha}{1-\alpha}} \cdot \frac{\partial M_u}{\partial N_{ur}} \cdot (p_c)^{\frac{\alpha}{1-\alpha}} \right]}{\left[1 + (p_{Gu})^{\frac{\alpha}{\alpha-1}} \cdot (M_u)^{\frac{\alpha}{1-\alpha}} (p_c)^{\frac{\alpha}{1-\alpha}} \right]^2},$$

$$\frac{\partial C_{ur}}{\partial N_{ur}} = \frac{-y_{ur} p_c \left[\frac{\alpha}{\alpha-1} (p_{Gur})^{\frac{1}{\alpha-1}} \cdot \frac{\partial p_{Gur}}{\partial N_{ur}} \cdot (M_{ur})^{\frac{1}{1-\alpha}} \cdot (p_c)^{\frac{\alpha}{1-\alpha}} + \frac{1}{1-\alpha} (p_{Gu})^{\frac{\alpha}{\alpha-1}} \cdot (M_{ur})^{\frac{\alpha}{1-\alpha}} \cdot \frac{\partial M_{ur}}{\partial N_{ur}} \cdot (p_c)^{\frac{\alpha}{1-\alpha}} \right]}{\left[1 + (p_{Gur})^{\frac{\alpha}{\alpha-1}} \cdot (M_{ur})^{\frac{\alpha}{1-\alpha}} (p_c)^{\frac{\alpha}{1-\alpha}} \right]^2}$$

因为 $M_u = m_u(N_u + N_{ur})$, 所以 $\frac{\partial M_u}{\partial N_{ur}} = m_u > 0$, 从而 $\frac{\partial C_u}{\partial N_{ur}} < 0$ 。

而 $\frac{\partial M_{ur}}{\partial N_{ur}} = \beta m_u > 0$, $\frac{\partial p_{Gur}}{\partial N_{ur}} = \theta \frac{\partial p_{Gu}}{\partial N_{ur}} = 0$, 所以 $\frac{\partial C_{ur}}{\partial N_{ur}} < 0$; 由 (4) 和 (6) 式以及前

文中的假设 $1 < \varphi$ 和 $1 < \theta$ 可知, $\left(\frac{C_{ur}}{y_{ur}} - \frac{C_u}{y_u} \right) < 0$, 从而 $\frac{\partial \left(\frac{p_c(N_u C_u^* + N_{ur} C_{ur}^*)}{N_u + N_{ur}} \right)}{\partial N_{ur}} < 0$ 。这表明, 随着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 会使得整个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会减小。没有户籍转变、只考虑人口转移的城镇化进程会降低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

(三) 户籍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

而当城市居住的农村户籍人口不断向城市户籍人口转变, 并实现市民化时, 意味着半城镇化水平在下降。户籍城镇化进程中, 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的影响可以体现在随着人口结

构变动, 消费倾向的相对变动。 $\frac{p_c(N_u C_u^* + N_{ur} C_{ur}^*)}{N_u + N_{ur}}$ 分别对 N_{ur} 和 N_u 取偏导数可以得到:

$$\frac{\partial \left(\frac{p_c(N_u C_u^* + N_{ur} C_{ur}^*)}{N_u + N_{ur}} \right)}{\partial N_{ur}} = \frac{p_c}{(N_u y_u + N_{ur} y_{ur})^2} \left[(N_u y_u + N_{ur} y_{ur}) \left(N_u \cdot \frac{\partial C_u}{\partial N_{ur}} + N_{ur} \cdot \frac{\partial C_{ur}}{\partial N_{ur}} \right) + N_u y_{ur} y_u \left(\frac{C_{ur}}{y_{ur}} - \frac{C_u}{y_u} \right) \right] \quad (A8)$$

$$\frac{\partial \left(\frac{p_c(N_u C_u^* + N_{ur} C_{ur}^*)}{N_u + N_{ur}} \right)}{\partial N_u} = \frac{p_c}{(N_u y_u + N_{ur} y_{ur})^2} \left[(N_u y_u + N_{ur} y_{ur}) \left(N_u \cdot \frac{\partial C_u^*}{\partial N_u} + N_{ur} \cdot \frac{\partial C_{ur}^*}{\partial N_u} \right) + N_{ur} y_{ur} y_u \left(\frac{C_u^*}{y_u} - \frac{C_{ur}^*}{y_{ur}} \right) \right] \quad (A9)$$

因为 $\frac{\partial p_{Gur}}{\partial N_u} = \theta f'(N_u)$, $\frac{\partial p_{Gu}}{\partial N_u} = f'(N_u)$, 而对于城镇居民整体而言 $(N_u + N_{ur})$ 并没有

改变, 因此 $\frac{\partial M_{ur}}{\partial N_u} = 0$, $\frac{\partial M_u}{\partial N_u} = 0$ 。进一步可以得到, $\frac{\partial C_u}{\partial N_u} = 0$, $\frac{\partial C_{ur}}{\partial N_u} = 0$,

$$\frac{\partial C_u}{\partial N_u} = \frac{-y_u p_c \left[\frac{\alpha}{\alpha-1} (p_{Gur})^{\frac{1}{\alpha-1}} \cdot f'(N_u) \cdot (M_{ur})^{\frac{1}{1-\alpha}} \cdot (p_c)^{\frac{\alpha}{1-\alpha}} \right]}{\left[1 + (p_{Gur})^{\frac{\alpha}{\alpha-1}} \cdot (M_{ur})^{\frac{1}{1-\alpha}} (p_c)^{\frac{\alpha}{1-\alpha}} \right]^2} > 0,$$

$$\frac{\partial C_{ur}}{\partial N_u} = \frac{-y_u p_c \left[\frac{\alpha}{1-\alpha} (p_{Gu})^{\frac{1}{\alpha-1}} \cdot \theta f'(N_u) (M_u)^{\frac{1}{1-\alpha}} \cdot (p_c)^{\frac{\alpha}{1-\alpha}} \right]}{\left[1 + (p_{Gu})^{\frac{\alpha}{\alpha-1}} \cdot (M_u)^{\frac{1}{1-\alpha}} (p_c)^{\frac{\alpha}{1-\alpha}} \right]^2} > 0$$

最终可以得到 $\frac{\partial \left(\frac{p_c(N_u C_u^* + N_{ur} C_{ur}^*)}{N_u + N_{ur}} \right)}{\partial N_u} - \frac{\partial \left(\frac{p_c(N_u C_u^* + N_{ur} C_{ur}^*)}{N_u + N_{ur}} \right)}{\partial N_{ur}} > 0$ 。这意味着当城市人口由非

城镇户籍向城镇户籍转移时, 城镇居民的整体消费倾向会得到提升。即户籍城镇化能够有效推动城市居民的整体消费能力。

附表1 微观实证部分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PU</i>	半城镇化率 (%)	7360	17.7	8.63	1.42	39.1
<i>res</i>	居民消费倾向	7360	0.589	0.227	0.0294	1.000
<i>lnincome</i>	家庭总收入的对数	7360	10.72	0.707	7.859	12.24
<i>age</i>	户主年龄	7360	51.81	13.49	16	97
<i>hukou</i>	户口状态 (1=非农户口; 0=农业户口)	7360	0.639	0.480	0	1
<i>eduy</i>	受教育年限	7360	8.643	4.638	0	22
<i>male</i>	户主性别 (1=男性; 0=女性)	7360	0.563	0.496	0	1
<i>marry dum</i>	是否已婚 (1=已婚; 0=未婚)	7360	0.877	0.329	0	1
<i>health dum</i>	是否健康 (1=健康; 0=不健康)	7360	0.867	0.340	0	1
<i>work_not</i>	是否工作 (1=工作; 0=没有工作)	7360	0.533	0.499	0	1
<i>lnasset</i>	家庭净资产的对数	7360	12.00	3.084	0	15.08
<i>familysize</i>	家庭规模 (单位: 人)	7360	3.414	1.510	1	17
<i>social medical</i>	是否有社会医疗保险 (1=有; 0=没有)	7360	0.850	0.357	0	1
<i>old_num</i>	老人数量占比 (单位: %)	7360	0.387	0.687	0	4
<i>child_num</i>	儿童数量占比 (单位: %)	7360	0.427	0.664	0	5